

## 關於戰前台灣總督府官員退官後之經濟活動之研究

著者	？ 紹恒
journal or publication title	Study of Bureaucracy of the Japanese Colonial Empire
volume	30
page range	123-132
year	2008-01-31
その他のタイトル	台湾總督府官僚と技術移転に関する研究
URL	<a href="http://doi.org/10.15055/00002591">http://doi.org/10.15055/00002591</a>

# 關於戰前台灣總督府官員退官後之經濟活動之研究

黃 紹恒

国立交通大学（新竹）

## 1・前言

近代日本天皇制國家可說是以天皇為頂點，「華族」為其藩屏，然後在外圍以官僚制所形成的支配體制。官僚制以天皇為基軸形成位階秩序而成立，天皇制國家權力則以官僚對民眾的直接支配而得以實現<sup>1</sup>。當然，近代日本的官僚制的完備，仍必須有以文官考試系統及以帝國大學為頂點的教育系統作為其實質的基礎。1889年2月的「大日本帝國憲法」的公布及翌（1890）7年第1回眾議院總選擇，則可說是天皇制國家成立的象徵。到日清（甲午）戰爭爆發的時點，包括警察、軍事機構，近代日本的官僚體制可說已然整備完成。

1895年台灣進入日本的殖民統治期，以台灣總督府為頂點的殖民地官僚體制亦在台灣成立，然而在1889年憲法未曾設想到日後日本國土會有所增減的情況下，使得殖民地官僚制度建立伊始，就遇到殖民地台灣在日本帝國國家權力構造的地位問題。1896年4月因「六三法」的成立，雖說建構的台灣總督掌握在台灣行政、立法、司法3權之的支配體制，然而卻未必意味上述屬於憲法層級問題已獲得解決。儘管如此，殖民地台灣的官僚制度由於實際的迫切需要，無法等待此問題的解決，而是隨著台灣總督府官制的制定與修改逐步建立。不言自明，理解日本對台灣的殖民地統治，對以台灣總督府為核心的台灣官僚制之理解，就方法論而言乃為不可欠缺，甚至在理解殖民統治時期台灣社會經濟的變遷，亦為重要的入門。只是就目前的研究現狀而言，由於其研究成果的有限，使得吾人對此問題的了解亦極為有限，亟待從各角度切入作深入而且廣泛的討論與研究。

就官僚制與殖民地時期台灣經濟的關聯，可舉出波形昭一氏的「殖民地台灣の官僚人事と經濟官僚」一文，同文的考察時間設定在日本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到1930年代前半的政黨內閣時期，指出此時期的台灣呈現所謂「石を投げれば役人に當あたる」，即官僚大量存在的一種殖民統治型態，波形氏強調日本的殖民地統治在這方面的傾向特別明顯。同文主要運用殖民地時代所出版的人事資料<sup>2</sup>分析屬於高等官官僚的學歷及經歷構造，並就台灣總

1 石井寬治《日本經濟史 第二版》（東京大學出版會，171頁）。

2 包括大園市藏編《台灣人物誌》（谷澤書店，1916年）及《台灣の中心人物》（日本殖民地批評社，1935年）、橋本白水《台灣之官民》上篇（台灣案內社，1919年）、田中一二《台灣の新人舊人》（台灣通信社，1928年）、永岡芳輔《在京一年有半》（實業時代社台灣支社，1929年）、林進發編《台灣官紳年鑑》（民眾公論社，1932年）、台灣新民社編《台灣人士鑑》（台灣新民社，1934年）及《改訂台灣人士鑑》（1937年）、原幹洲編《南進日本之第一線に起つ新台灣人物》（勤勞と富源社，1936年）、新高新報社編《台灣紳士名鑑》（新高新報社，1937年）、太田肥洲編《新台灣を支配する人物と産業史》（台灣評論社，1940年）、秦郁彥《戰前期日本官僚制の制度・組織・人事》（東京大學出版會，1981年）。本文有關波形研究之內容，皆引自所著「殖民地台灣の官僚人事と經濟官僚」（《近代日本の經濟官僚》日本經濟評論社，2000年6月，303-336頁）。

督府財務局與殖產局的政策理念進行檢討，說明殖民地台灣官僚制，特別是高等官層級的實態。由此可了解到不論殖民地台灣在日本帝國的權力構造所處地位有如何的變化，近代日本的官僚制度的確也在台灣落地生根，充分發揮天皇制國家權力支配台灣住民的執行角色。

當然，殖民地台灣的官僚除了波形氏所檢討的高等官之外，尚存在人數更多層級較低的「役人」的存在，這些人及其家族在日本領有台灣 10 年後的日俄戰爭期左右，不僅已經是在台灣日本人社會的主要構成而且是日本商品的主要顧客，其住所分布地區則以台灣總督府統治權力較有效施行的島內幾個城市為主<sup>3</sup>。不過，這也只是外來統治者在尚未鞏固其統治基盤情況下的短暫現象，日俄戰後，隨著台灣總督府更為有效地維持台灣秩序，以及以糖業資本為主的日本國內資本的來台，整個在台灣日本人社會的發展可說獲得一個發展的契機。同時也促使整個殖民地台灣社會經濟等各方面，開始脫離清代台灣的構造，在承受近代日本強烈影響的情況之下，往近代台灣的道路摸索前進。

這些無論在學歷或經歷條件皆不易在往上升遷的中下層官僚，面對台灣社會開始的這種新變化，究竟扮演著如何的角色？由於這些人是台灣人在日常生活最直接接觸的日本人，甚至是殖民地時期台灣人所抱持「日本像」的原型，因此可說是理解日本殖民地時期台灣社會的重要面向之一，惟限於筆者的能力，本稿僅就其在退官之後的經濟活動作儘可能的全面調查與檢討。

其主要理由在於台灣進入日本殖民統治伊始，被認為是個風土、人情對日本人而言皆極為危險的地區，但是亦被認為是個富源未開、充滿各種發展可能性的新天地。殖民地初期非京阪地區的食鹽、樟腦、砂糖等產地的中小業者，在本國相同產業面臨國外製品競爭，瀕臨存續危機之秋，可說抱持著相當大的期待一般，看中台灣未曾開發「富源」而復於冒險精神，卻缺乏足夠資金力量的日本人亦在不少。這些站在政策第一線的中下層官僚對於台灣作為開發的「富源」及相隨而來的致富機會與風險，當然比其他的日本人更為了解，在仕途無望的情況下，他們是否也參與這種具冒險性的經濟活動，便成為本稿論述的出發點。

原本欲以今日現存於國史館台灣文獻館的《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史料群中所留下大批的人事資料，進行詳細的整理與運用，由於諸般原因致使本稿實際上未能運用這批史料。暫且亦如上引波形研究一般，主要運用殖民地時期所出版 who's who 之類的資料，以明治期、大正期及戰前昭和期的時期區分方式，先給予一個概略的觀察，至於較全面而且深入的整理與檢討，只得留待日後再行修正與補充。

## 2. 明治期

1895 年日本的接收台灣，在本質上與軍事佔領並無太大的區別，在社會動盪不安的情況下，當然無法立刻見到日本人在新領土旺盛的經濟活動。不過，這種情形隨著台灣總督府統治機構的整備，台灣社會情勢漸趨穩定，日本人對台灣社會了解的深化，即使起步仍然困難重重，但是如同表 1 所列明治期本店設於台灣的企業組織，雖然未必能完全網羅當時所有

3 黃紹恆「日治初期在台的生成與積累」（《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32 期，1998 年 12 月，165-214 頁。

表 1 明治期本店設於台灣的日資企業

1897	台北倉庫株式會社（5 萬圓*）、台阪合同會社、台灣驛傳社（10 萬圓*）、台灣工業組、日本物產合資會社、台灣製冰株式會社（3 萬 7000 圓）
1898	十字商會、台灣日日新報（10 萬圓）
1899	臺灣銀行（250 萬圓）、台灣貯蓄銀行（3 萬 7500 圓）、佐藤組（2 萬圓*）
1900	嘉義煉瓦製造株式會社（1 萬圓*）、雲林合資會社（1 萬 5000 圓*）、台南請負合資會社（5 萬圓*）、台灣製糖株式會社（85 萬圓）、台灣商業銀行（20 萬圓）
1901	高陽商會（2 萬圓*）、宜蘭商業株式會社（2500 圓）
1902	日台林木合名會社（2 萬圓）、台中物產合資會社（1 萬圓）、台灣採腦拓殖合資會社（1 萬圓）、台南土木組（1 萬 5000 圓*）、台南屠畜株式會社（6800 圓）、灣中物產合資會社（1 萬圓）、甲仙埔採腦拓殖合名會社（10 萬圓）
1903	台南新報社（3 萬圓）、中部台灣日報社（1 萬圓）、梅鉢商會（7500 圓）、台南治腦合名會社（4 萬 5000 圓*）、辰馬商會（5 萬圓）、台灣製帽合資會社、台灣運送合資會社（3 萬圓*）、山根商會（1 萬圓）
1904	金星合名會社（1 萬圓*）、嘉義製紙合名會社（1 萬 6200 圓*）、林德行（1 萬圓）、台華植民合資會社（2 萬圓*）、加土兄弟合名會社（1 萬圓*）
1905	吉野屋商會（2 萬圓*）、台北劇場株式會社（6 萬圓*）、基彭興業合資會社（1 萬 5000 圓*）
1906	協興公司（1 萬 5000 圓*）、明治製糖株式會社（25 萬圓）、台灣煙草販賣合資會社（1 萬圓*）、台中輕便鐵道株式會社（1 萬 5000 圓）
1907	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125 萬圓）、大東製糖株式會社（125 萬圓）、東洋製糖株式會社（125 萬圓）、打狗倉船合資會社（2 萬圓*）、台灣產業合資會社（6 萬圓）、台南製糖株式會社（76 萬 2500 圓）、松本商店（8 萬圓*）、新竹製腦株式會社（5 萬圓）、共同商會（1 萬圓*）、基隆水產合名會社（1 萬 2500 圓*）、三友合名會社（1 萬 2000 圓*）
1908	櫻井組（10 萬圓*）、台灣殖產株式會社（5 萬圓）、基隆荷役株式會社（3 萬 2500 圓）、新竹製材株式會社（8750 圓）、雲林拓殖合名會社、全台日報社（2 萬 5000 圓）、柵瀨兄弟商會（5 萬圓*）、澎湖海產株式會社（7500 圓）、台灣建物株式會社（25 萬圓）、台灣鐵工株式會社（25 萬圓）
1909	城崎商會（5 萬圓*）、淡水戲館合資會社（10 萬圓*）、台北精米所（3 萬 3000 圓）、台灣興農合資會社（5 萬圓*）、高砂製糖株式會社（62 萬 5000 圓）、新高製糖株式會社（125 萬圓）、台中作業合資會社（1 萬圓*）、台灣帽子原料合資會社（6000 圓）、打狗整地株式會社（12 萬 5000 圓）
1910	台灣採藤合資會社（3 萬圓*）、日本台灣茶株式會社（25 萬圓）、河野吳服店（2 萬圓*）、台灣產業株式會社（12 萬 5000 圓）、台北製糖株式會社（75 萬圓）、斗六製糖株式會社（75 萬圓）、北港製糖株式會社（75 萬圓）、埔里製糖合資會社（30 萬圓*）、北港製酒合名會社（1 萬 2000 圓*）、台灣製油株式會社（3 萬 7500 圓）、嘉義製作所（5 萬圓*）、台灣運輸倉庫株式會社（5000 圓）、山光商店（3 萬 5000 圓*）、台東拓殖合資會社（90 萬圓）、台灣商工銀行（25 萬圓）、台中劇場株式會社（1 萬 4000 圓）、高石組（10 萬圓）、中央製糖株式會社（125 萬圓）、帝國製糖株式會社（125 萬圓）、台灣肥料株式會社（7 萬 5000 圓）
1911	葫蘆墩輕便鐵道合資會社（3 萬圓*）、台南大舞台株式會社（2 萬 5000 圓）、打狗巡航船株式會社（1 萬 2500 圓）、台灣漁業合名會社（2 萬 2000 圓*）、台灣海陸產株式會社（25 萬圓）、紅新鐵道合資會社（3 萬圓*）、台灣糖蜜株式會社（5 萬圓）、埔里社製糖株式會社（66 萬圓）、敕使河原商行（1 萬圓*）、協立商會（4 萬圓*）、共和商行（2 萬圓*）、台灣冷藏合資會社（5 萬圓*）、台灣信託合資會社（5 萬 2500 圓*）、台中製冰株式會社（5 萬圓）、台灣水產株式會社（7 萬 5000 圓）、台灣蠶絲業株式會社（1 萬 2500 圓）、台灣石鹼株式會社（5 萬圓）、台灣瓦斯株式會社（25 萬圓）

資料：「本島ニ於ケル會社ニ關スル事項取調ノ件」（《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追加第 8 卷，1897 年）、由井常彥・淺野俊光編《日本全國諸會社役員名簿》（柏書房，1988 年 7 月）。

說明：轉引自黃紹恆「日治初期在台的生成與積累」（《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32 期，1998 年 12 月）表 13。

\* 表示帳面資本額。



的日資企業，但是從數量上可看出日本人在台灣設置企業，大致要在日本領台後 10 年，即日俄戰爭之後才有明顯的增加。

同時，在業種方面亦有明顯的增加、多樣化，製糖業之外，尚可看到肥皂、瓦斯，倉儲、運輸、戲院之類，對台灣社會而言，可說是新興的產業。

根據由井常彥、淺野俊光編《日本全國諸會社役員名簿》所收錄總公司設於台灣的企業及其重役的名單，大概可找出約 377 名的人名，其中大概有一半以上可以在《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找到相關資料，相信有許多曾擔任過台灣總督府及其所屬機關的職務。

### 3・大正期

此時期本稿以大園市藏《台灣人物誌》（谷澤書店，1916 年）及上村健堂《台灣事業と中心人物》（1918 年）所收錄之人物資料為基礎，予以鳥瞰式的觀察。

1916 年的《台灣人物誌》計 66 人，大約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的狀況，1918 年的《台灣事業と中心人物》則為同戰爭爆發之後，戰爭所引發的「特需景氣」，應該已經降臨日本經濟，計 28 人。而且至少有 6 人重複，所以實際上共計 88 人。

不知是否因編纂者的選定基準不同，就在官期間擔任職務與退官後所從事業種，因為需要比較專門知識而有所關聯者，除了醫療方面外，比較明顯關聯者，大概可舉出製糖業，如相馬半治（明治製糖）、石川昌次（新興製糖）。其他，曾任官職地區從事經濟活動者，則可看見如伊東義路、早川直義、青池伯等例子。

表 3 所列退官前後的關聯性，似乎更不明顯。不過，照合表 2 的資料，假設兩表已將當時台灣曾任台灣總督府及相關機構的重要人物皆網羅進去的話，或許可說大正時期退官後的再就職，其種類似乎較為多種多樣。而且，與日本國內的戰爭「特需景氣」無直接關聯，或可說有相當部份比較像是為了滿足在台日本人生活所需的業種。另外，此處雖然目前並無資料能夠補充說明，不過由退官後的經歷看起來，兩表所收錄之人物，似乎在相當年輕的時候便退官，尋求人生另外的新發展。

### 4・戰前昭和期

此時期則使用了 1937 年新高新報社編《台灣紳士名鑑》及 1943 年的興南新聞社之《台灣人士鑑》所收錄之人物資料。《台灣人士鑑》就所收錄之人物資料，說明其收錄基準為於「島內有住所之所有階級有名之士，以及曾在台灣居於重要位置或最近才轉出海外的台灣關係者」<sup>4</sup>，不過亦如該編者在卷頭所言明，仍不免會有遺漏之處，相信仍有許多合乎本稿所欲探討之人物，卻因為具知名度等原因而未被收錄在內。因此與上述明治、大正期一樣，本期所能作到的也只是一個概觀性的觀察而已。

不過，與 1937 年的《台灣紳士名鑑》比較，堪稱殖民地後期出版的《台灣人士鑑》所收錄人物資料，可舉出若干特色。第一，此時期受到台灣總督府「改姓名」政策的影響，所收錄的台灣人有許多有日本式的氏名，但是稍予推敲與其原漢文姓名之關聯，可看出當事人在

4 興南新聞社編《台灣人士鑑》（興南新聞社，1943 年）「凡例」。

表 2 《台灣人物誌》所收錄相關之人物資料

18 頁	村田義教，總督府陸軍憲兵隊附，日本瓦販賣
19 頁	相馬半治，總督府糖務局技師，明糖
21 頁	伊東義路，嘉義典獄，嘉義製紙合名會社、嘉義電燈株式會社社長
22 頁	乾林三，台南廳、鹽水港廳奉職，藥種商及度量衡器販賣
22 頁	岩田仙吉，新竹醫院、苗栗醫院、台東醫院奉職，和洋雜貨吳服太物小間物商
23 頁	岩田三省，台灣公醫、澎湖廳大赤崁等地在勤
23 頁	板倉勝憲，總督府專賣局及土木局囑託，大正生命保險株式會社台灣支部主任
29 頁	石原康揆，警察官，艋舺霧島旅館主
31 頁	早川直義，嘉義辨務署主記等職，嘉義同伸社長兼嘉義商工組合副組長
37 頁	西村龜三，宜蘭廳、苗栗廳、新竹廳奉職，苗栗輕便鐵道株式會社
37 頁	二宮儀之助，台南縣警部等職，大正藥房、嘉義家畜市場、村井造林所
38 頁	西村健藏，總督府土地調查局技手，質屋業及礦業
39 頁	西村瀧三郎，總督府土地調查局測量課檢查係，高石組、共同組土木請負業
42 頁	星加彥太郎，守備隊附，日本棉布卸商、日本鹽魚販賣
44 頁	渡嘉敷唯良，新竹辨務署主記，土地開墾、畜產合名會社、台灣貿易株式會社
44 頁	富山朝輔，陸軍憲兵隊，製鹽、醬油釀造、雜貨販賣、料理屋
65 頁	野口要次郎，台北醫院醫務囑託等職，花蓮港開業
70 頁	小倉胖，某官衙在勤，橫濱增田增藏台南支店、芳釀社取次店、米糖雜穀商
74 頁	諏訪忠藏，總督府財務局、鳳山縣台南縣警部、恆春廳警務課長，台灣產業株式會社、紅咸鐵道株式會社
87 頁	吉田幸夫，台北醫院囑託，吉田齒科
92 頁	中村熊一，官衙奉職，土木建築請負業、自轉車販賣業
100 頁	前田耕作，台南辨務署奉職，寫真術
108 頁	青山彥松，卑南郵便局奉職，和洋雜貨小間物吳服太物商
109 頁	安倍馬治，嘉義廳奉職，釀造業
111 頁	青池伯，嘉義縣署、嘉義辨務主記等職，嘉義總爺雜貨商
117 頁	笹川熙熊，總督府鐵道部囑託等職，和洋酒食料品商
139 頁	澀谷孝慶，台灣守備隊步兵第一大隊附，台北開業
140 頁	木村丁吉，總督府警察官，牛乳榨取業、台灣輕鐵會社、共濟會社
141 頁	芝原太次郎，台中廳、南投廳技手，彰南鐵道會社
143 頁	白井一，總督府醫院囑託，白井藥局
143 頁	梅野清太，台灣重砲兵隊附，賀田組
149 頁	木南正，宜蘭廳、嘉義廳警務課，樂水亭料亭
152 頁	坂本登，陸軍幕僚、埔里社撫墾署、辨務署，沖台拓殖製糖株式會社
154 頁	竹內龜七，專賣局書記，鹽務支館
158 頁	野副茂人，台中縣、斗六廳警察官，沖台拓殖製糖會社輕便鐵道部長
163 頁	近藤鶴松，總督府鐵道部三叉河醫務室勤務，藥種賣藥商
166 頁	齋藤剛，財務局、通信局、專賣局，造庭事業
173 頁	藤本鐵治，總督府技手、技師、財務局，清釀事業
186 頁	小林丈夫，總督府囑託，牛乳榨取販賣業
198 頁	真木勝太，嘉義廳，嘉義電燈、台灣產業、嘉義製冰
201 頁	上田英雄，專賣局書記，台灣粉末樟腦商會、台灣鹽業
202 頁	大島鷹造，警察官，太陽堂菓子舖
202 頁	宇都宮謙藏，土地調查局、新竹廳、專賣局腦務係長，產業會社
203 頁	松本徒爾，後備陸軍步兵曹長，新竹電燈

206 頁	飯尾松之助，軍隊奉職，雜貨商
213 頁	井門義衛，陸軍台南運輸部支部勤務，日本郵船花蓮港取扱店、日東商船組花蓮港支店
221 頁	足達虎雄，公醫，仁和堂醫院
227 頁	下永兼敏，總督府郵便官吏、台北郵便局會計課長，金錢貸付業
232 頁	上瀧宇太郎，澎湖廳雇員，土木請負及海陸運送業、澎湖海產、澎湖電燈
235 頁	吉岡才次郎，近衛兵站司令部員，小間物商、和洋食料理屋
269 頁	巖橋章山，總督府殖產局囑託，銅石版印刷及寫真製版業
275 頁	谷山愛太郎，台中縣辦務署主記等，台灣煙火
278 頁	上田常吉，田部兵站官澳底登陸，人力車、樂器等
287 頁	矢野友之丈，台中縣、彰化廳、台中廳奉職，彰化銀行南投支店
294 頁	木村儀作，台北醫院皮膚科長，開業醫
301 頁	石川昌次，總督府糖務局囑託，新興製糖
303 頁	阿部兵熊，台灣公醫後壠等地在勤，好生病院
306 頁	伊藤政重，總督府法院判官，南日本製糖、台灣蓄財建築
310 頁	楠田金之丞，總督府土地調查局奉職、稅關長代理，打狗土地買收貸家業
321 頁	木村匡，總督府秘書官，三十四銀行台灣支店總支配人、台灣商工銀行頭取
322 頁	木下新三郎，總督府人事課兼文書課長，台灣日日新報、東洋製糖、台灣建物等
323 頁	大庭永成，總督府殖產課長，日本台灣茶株式會社
330 頁	井野邊幸如，警務課長，台東製糖
332 頁	富地近思，總督府官吏，台南新報
343 頁	岡村勇吉，陸軍憲兵軍曹，有價證券現物問屋業
344 頁	芳賀敏五郎，總督府技師、殖產局農商課、台北廳雇員，北投製酒

選擇日本式氏名所花費的心思<sup>5</sup>。其次，所採取而得的原為台灣總督府官僚的人數，有非常明顯的增加。本稿在《台灣紳士名鑑》採集到 100 人，在《台灣人士鑑》則為 318 人，其原因仍有待推敲，不過如對戰前日本近代製糖業及糖業聯合會有相當程度影響力並曾任台灣總督府殖產局長的中瀨拙夫，在 1937 年仍為現職官員，但是到了 1943 年卻已經退官在野的情形，隨著收錄時間的越晚近，退官而轉任民間企業的人數因而增加，應屬可理解的現象。

然而，兩資料所收錄的人物之重疊程度，卻很難說極大，使得只能就各資料作不同時期的描述，而難有通時連貫性的說明與理解。因此，1937 年的《台灣紳士名鑑》或許可用來管窺戰前昭和期初期的情形，而 1943 年的《台灣人士鑑》則反映出殖民地後期的概況，兩期間的關聯性則不予討論。

首先，就 1937 年的情形，作若干考察。

就在官期間擔任職務與退官後所從事業種的關聯而言，有比較明顯關聯者，可說屬於需要專門知識的業種，最明顯的例子殆為醫療與法律方面的情形。在所採集的 100 人當中，曾

5 由於台灣漢人應對台灣總督府「改姓名」政策的過程及內容非本稿之討論重點，因此不予深入討論。不過，於此姑且舉出一例，例如同書第 7 頁的「明石萬造」、「明石道男」及 473 頁的「明石勳長」的原名分別為「朱萬」、「石孜道」、「朱阿貴」，顯然「明石」的あかしの日語發音與「朱」のあか發音有關，而「石孜道」改為明石則因為「石」的漢字。但是，必須留意的是並非所有台灣人都擁有日本式的氏名，有相當多人依舊維持原漢文姓名。

表 3 《台灣事業と中心人物》所收錄人物之職經歷

181 頁	揖場徹，土木局事務官，台灣精製樟腦
181 頁	伊東義路，嘉義典獄，嘉義電燈等
181 頁	石丸長城，番薯寮撫墾署官吏
184 頁	速水經憲，台南郵便局長，新高製冰
187 頁	富地近思，得到兒玉源太郎賞識一度任官，台南新報
187 頁	富田榮太郎，土木局技師，土木建築請負業、石炭
194 頁	岡本福太郎，台南廳支廳長，台糖
194 頁	小畑勇吉，總督府推薦為福州高等師範學堂教師，南日本製糖
195 頁	小川要七，台北廳事務官、財務課長（高山仰人脈），台北電氣工業
197 頁	大亭永成，總督府殖民課長，台灣茶公會顧問、台北信用組合會長。新高銀行顧問
199 頁	渡邊發藏，新竹廳事務官，展南拓殖
200 頁	川原義太郎，台南法院長，明治製糖、台灣漁業、台南公館、大正無盡、台南電鐵
201 頁	勝部鐘一郎，通信屬，賀田組、鹽糖
209 頁	高木鐵男，總督府糖務局，明糖
210 頁	田中時哉，澎湖島重砲兵大隊附，賀田組、花蓮港物產合名會社
212 頁	相馬半治，總督府糖務局技師，明糖
217 頁	中村熊一，明治35年止官衙奉職，宜蘭土木建築請負業
219 頁	梅野清太，台灣重砲兵隊附，賀田組
223 頁	山本利涉，通信事務官、台南郵便局長，煙草賣捌人、驛傳社顧問
225 頁	松岡富雄，大目降糖業試驗場，松岡製糖所、松岡拓殖合資會社
241 頁	相澤時進，台北廳庶務課，基隆輕鐵專務
246 頁	阪上椿藏，台中廳會計係長，台灣製麻專務
250 頁	木村匡，總督府秘書官，三十四銀行台灣支店總支配人、台灣商工銀行頭取
251 頁	木村正夫，南投公醫，日月潭起工等
257 頁	城本熊造，總督府鐵道部技術員，鐵工場、高砂鑄造
265 頁	瀨谷房之助，總督府屬，台灣倉庫
265 頁	諏訪忠藏，總督府財務局屬、警部、恆春廳警務課長，赤司商店總支配人
266 頁	鈴木金之介，總督府通信書記、台北郵便局郵便課長、苗栗淡水打狗基隆郵便局長，南洋開發組合理事

經在台灣總督府所屬醫療體系任職的人物計有 8 人，退官後多為開業醫師或經營藥局。

法律方面，曾在台灣總督府法院系統任判官，退官後轉業為辯護士之人有 7 人。不過此時期辯護士的來源尚有來自檢察官系統、行政官系統，這類的例子各有 3 人。另外，與法律相關的行業尚有代書業則有 4 例，都是警察系統出身。

而在比較不需要專業知識方面的業種，則可舉出原在專賣局系統任職，退官之後轉為專賣品「賣捌人」的情形，這類的例子有 7 人。

另外，例如第 21 頁的石田光間曾任職台灣總督府警察本署，退官後則經營與管制有關之「賣藥類似品移入業」，兩者之間顯然有相當程度的關聯。或是第 99 頁的貝山好美經歷殖產方面的官職，退官後則參與台中州青果同業組合、台灣正米市場組合之類業務，其原因亦可想像得到。屬於這類情形之人物，至少在 10 人以上。

退官後再就業地區與其職歷的地理關係而言，亦即如第 5 頁所記載和泉種次郎初任台北

縣辦務署書記，退官後所參與之企業計有基隆劇場、台灣水產、基隆冷藏等位於台北基隆地區企業之情形。政府官員退官後轉任與其在官時期有關的業種、區域之企業，在今日日本以官員的「天下り」而受社會批判，台灣亦以所謂「旋轉門條款」的法律禁止官員以退官後之考量，枉法圖利特定廠商業者。不過，本稿所討論之地理關係是否屬於「天下り」，則尚須進一步的探討才能有定論。這類的情形至少可有 20 例，可判知種轉業情形甚為普遍。

另外，至少到 1960 年代依然在台灣人的記憶當中留下深刻印象的警察，在退官之後的發展又是如何的情形？以本資料所收錄內容而言，曾經擔任過巡查、警部、署長等警察相關工作者計 24 人，退官後的職業首位為組合理事之類者 8 人，其次依序為專賣品「賣捌人」7 人、代書業 4 人，其他 5 人分別為「賣藥類似品移入業」、台糖社員、文房具商、台灣南部無盡會社屏東支店長、台南タクシー專務取締役。

接著再就 1943 年《台灣人士鑑》的內容，依照上述的項目作同樣的集計。由於所收錄資料的相對豐富，因此可從其中發覺許多值得思考的現象。

就在官期間擔任職務與退官後所從事業種的關聯而言，此時期依舊以需要專門知識的業種，所謂「專門職」，有比較明顯的關聯，醫療與法律方面在人數上仍屬最多。不過，其中台灣人的存在，特別是台灣人醫師的明顯存在，為值得一提的現象。另外，工科方面的技術人員極為少見，此情形或許印證了台北帝國大學教授楠井隆三氏於所著《戰時台灣經濟論》所言，台灣需要的不只是高級的技術人員，更須技術移民，從日本國內引進中低層級的技術人員。

在所採集的 318 人當中，曾經在台灣總督府所屬醫療體系任職的人物計有 55 人，退官後多為開業醫師或經營藥局。由於本資料收錄有當事人的學歷，可知這類人物皆出身自醫學方面的學校，包括大學醫學部、醫專，其中不乏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畢業者。

法律方面，曾在台灣總督府法院系統任判官及檢察官，退官後轉業為辯護士之人有 13 人。不過此時期辯護士的來源尚有來行政官僚 1 人、警察 1 人及公學校長 1 人。其中，前 14 人皆為大學法律學科畢業，後 2 人則是經過考試取得辯護士之資格。另外，與法律相關的行業尚有代書業則有 2 例，都是警察系統出身。

而在比較不需要專業知識方面的業種，亦可舉出原在專賣局系統任職，退官之後轉為專賣品「賣捌人」的情形，這類的例子有 29 人，另外行政官僚系統出身者則有 18 人、警察出身亦有 18 人，本資料所收錄「賣捌人」共有 64 人<sup>6</sup>。由此大致可推知，具獨占性利益的專賣利益，在殖民地末期即有可能作為酬備退職官員的工具，或是說台灣總督府為穩定其專賣事業利益，因此特別將這些人納入其專賣系統的末端。

另外，有「天下り」可能性的例子，即在官時執掌業務與退官後從事業種有關聯的例子，可有 29 人。惟此部份必須與相關的人事資料互相應證，才能有確切的認定，因此此處所舉數字仍有商榷餘地。

退官後在就業地區與其職歷的地理關係方面，包括上述「天下り」可能例，則有 96 人。

6 其中有若干例為同時具此 3 種身分，由於本稿皆在每種出身別接計算在內，因此 3 種合計人數會大於總數。

其中又以醫藥方面的關聯性最高，此外職位越低，關聯性似乎也比較明顯。

另外警察在退官之後的發展又是如何的情形？以本資料所收錄內容而言，有警察相關職歷者可有 80 人。一般而言，退官後轉業為醫師及辯護士者之學歷最高，警察系統特別是從巡查開始其職歷者，普遍學歷偏低，以今日的標準來看，中學學歷者不在少數。亦有許多人的學歷是空白，大概可推測當事人因學歷過低而不願意告訴此人士鑑的編纂者。至於退官後所從事的業種，退官後的職業首位為組合理事之類者 45 人，其中以信用組合及水利組合最多。其次依序為專賣品「賣捌人」18 人、具獨占性或統制性企業組織者 11 人。在 1943 年台灣經濟已然進入「戰時體制」，許多原有屬於民間產業的業種在「時局」的要求下，被迫帶有濃厚的管制性格，前述組合、專賣品賣捌人，以及台灣酒礮統制株式會社、台灣茶輸移出統制株式會社、嘉義郡製菓統制株式會社等層級不同的機構，堪稱其中的代表例子。由上述之集計可知具警察職歷的退官者在這類企業組織，顯然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眾所皆知，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特別是後期，警察對台灣的經濟活動的干涉堪稱日本統治台灣的特徵之一。上述警察職歷者的退官轉業情形，似乎意味著殖民地時代台灣的「經濟警察」，在型式上不僅是穿著制服的警察對經濟活動的直接監視、干涉，諸如此類退官轉任的作法也可能必須放入「經濟警察」問題的討論射程內。

## 5・結語

由於受限於資料及相關史料的不足，本稿所描述之「史實」仍需進一步的考據與修正，特別是現存以文字留下文獻史料所不能反映當時來台任職，然而在仕途上沒太大發展可能性的日本人，是在如何的想法及心境之下，作他人生的重大抉擇，決定在台灣落地生根，同時尋求另外的發展可能性？儘管在近年台灣學術界對日本殖民地時代台灣史的研究已有蓬勃發展，但是對於在台日本人社會、經濟、文化等各方面，其實所知有限，無法作較為真切的理解與說明。

如果在此作比較大膽的結語，綜合上述各資料所見，似乎可說明治期及大正期的退官者，其中較有成就而被收錄者，他們所從事的職業似乎跟他原官職即使有關聯性，但是似乎不如戰前昭和期的情形來得明顯。特別是到了殖民地末期，這些擁有官歷的人物似乎在國家權力的「動員」之下，主動或被動地選擇他們退官後的新發展。

## 要 旨

1895 年台湾は日本の植民地となり、台湾総督府を頂点とする植民地官僚体制が台湾において成立するが、大日本帝国憲法は日本の領土が増減することを想定していなかったために、直ちに植民地台湾は日本帝国の国家権力構造においてどのような地位を占めるかという問題に直面した。

1896 年 4 月「六三法」の成立によって、台湾総督府が台湾の行政立法司法の三権を掌握する支配体制が打ち立てられたとはいえ、憲法レベルの問題が解決されたとはまでは言えな

い状況だった。とはいえ植民地台湾の官僚制度は実際上の必要に迫られ、こうした問題の解決を待つゆとりはなかった。こうして台湾総督府官制の制定と改正にともなって次第に台湾植民地官僚制が作り上げられていった。言うまでもなく、方法論として、日本の台湾植民地統治を理解するために、台湾総督府を核心とする台湾官僚制を理解することは必要不可欠である。

植民地台湾の官僚としては、高等官以外にも、さらに多数の比較的低い地位の役人が存在していた。彼らとその家族は、日本が台湾を領有した約10年後の日露戦争期には、すでに在台湾日本人社会の主要な構成要素となっていたばかりでなく、日本商品の主要な顧客ともなっていた。その住所の分布していた地区をみると台湾総督府の統治権力が比較的及んでいた島内のいくつかの都市を主としていた。

学歴や経歴の如何にかかわらず容易に出世できない中下層官僚だった彼らは、台湾社会に生じていた新たな変化に直面しつつどのような役割を果たしたのか。また、このような中下層官僚は、台湾人が日常生活でもっとも直接的に接した日本人であり、ひいては、植民地期台湾人の抱いた「日本イメージ」の原型ともなった。したがって、日本の植民地期における台湾社会を理解する重要な一面といえよう。本稿は、筆者の能力の及ぶ限りで、彼らの退官後の経済活動をできる限り全体的に調査し検討しようとしたものである。

各種資料から得られた知見を総合すると、明治期および大正期の退官者の場合、比較的天下りに成功した者は現職と元の官職との関連性があったとしても、昭和戦前期の場合と比べるとそれほど明瞭ではないようである。しかし、特に植民地末期になると、元官僚たちは、国家権力による「動員」を受けたらしく、主体的にあるいは受動的に職を辞し、退官後の進路を選んだと思われる。